

2019年12月16日上午,我去看望了百岁高龄的杨苡先生。这是一次既偶然又策划已久的会面。自打我于2018年12月初探望她以来,杨先生一直盼望我能再次从美国回来晤面。

当我兴匆匆再次踏入那40年前我几乎隔三岔五就要踏入的小院,口中高喊“杨老师,杨老师”,出来为我开门的是杨先生70岁的儿子赵苏。我刚刚入座客厅里那张熟悉多年的沙发,杨先生便从卧室走了进来。虽说是依仗了助步的器械,老人的步伐依然矫健,身子骨还是那般硬朗,眼眸明亮,腰板笔挺。坐在她那固定位置的扶手椅上,杨先生开口便说:“我得要纠正你啊!我可不是你的恩师,我连一天都没有教过你。”

显然,她指的是我去年拜读她以后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百年恩师春常在》。的确,正如她所说,我没有在教室里听过她哪怕一节课。虽然我是南京师范大学(当时还叫师范学院)外语系77级的学生,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杨先生被长期剥夺了教书的权力,尽管她一直都是在编的教员。她也一辈子都没有顶过“教授”的头衔。

我问她如何能够保持身体这样健康,她答道:“我现在只能对人说,我是以不变,应万变!”老人的机警、俏皮,引来我和赵苏爽朗的笑声。她也随着我们,开心的脸上绽放出笑容。我说,不变才好啊,如今不是都说,要初心不变嘛。于是大家又再次开怀大笑。

我们见面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相互签名赠书。多年来,这已算是一项传统保留“剧目”。只要

世纪老人,不变是初心

■朱小棣



合影
▲ 本文作者拜访杨苡(右)

我们都有新书出版,总是要相互交换。每每我还不止得到一本,因为她往往同期会有多部书籍出版,或是相赠她哥哥杨宪益、二女儿赵蘅的书给我。甚至有一年还给了我一本她亲手网购的图书,说是抱歉没有新著出版。

这回我带去的,是我刚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闲读闲记》。杨先生嘱咐赵苏去拿来一本译林出版社专门为杨先生百岁生日制作的精装版画插图本《呼啸山庄》。半个多世纪前,杨先生翻译了这部世界名著,成了经典译本,不断再版,才有了少年儿童版。

杨先生在扉页上欣然签上:“小棣小友存念,杨苡,2019年12月16日”,感觉似乎还意犹未尽,于是又在已经盖好的书章下面补写了四个字:“友谊长存!”我手里捧着金砖般沉甸甸的巨著,眼望

她那依然娟秀如少女般的签名字迹,兴奋不已。

轮到她签名赠书了,我却开始犯难起来。我一向只用英文签名,因为我的汉字写得极差。可是到底该如何用英文称呼她呢?以往曾经用过“Professor”,可她立马就说“我没当过教授”。如今又当面纠正说不是我的恩师。我忽然灵机一动,不如归朴返真。想当初她年轻时一定用过她自己姓名的英文大写字母缩写“Y.Y.”,于是征得她的同意,我便欣然用上了。

从我手中接过书去,瞥了一眼书名“闲读闲记”,杨先生立刻叫好,说她一辈子最喜欢闲读。确实,这也正是我当年从她那里得益最多的地方。我随手一指赵苏背后的书橱对他,当年这个书橱里有一整排用白纸包皮的英文书籍,就是他母亲借阅给我闲读

完了之后我再利用日历牌纸的背面包上去的。去年杨先生二女儿赵蘅来帮助整理图书,才把所有外文书籍都从客厅搬进了卧室。

我向她介绍说,这是我第六本把“闲”字镶入书名的散文随笔集。杨先生说:“‘闲’字好,闲读最好,如今很少能有人坚持闲读了。况且你在闲读时,其实你的心不闲。”对呀,这正是她老人家充分理解我内心深处地方,这才叫做人生“知己”。

于是我又介绍说,我的文章总是谈书,可是从来不去注重书的中心主题,而是随便翻翻,总能找到我喜欢和感兴趣的内容。杨先生指着我说,当年你父亲就对我说:“杨老师,我的儿子桀骜不驯,您得替我教导教导他。”杨先生当时就回我父亲说:“孩子喜欢看书,独立思考,没什么不好。”这都是40年前的往事。说起来,还是不久前在美国逝世的巫宁坤先生介绍我认识了杨先生。那时我的姐姐朱小蔓是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届工农兵学员,结识了外文系教师巫宁坤,希望他能指导我的英语学习。他说有位学姐就在南京,可以就近指导,于是便领着杨先生来到我家。我后来又回访了杨老师和她的丈夫赵瑞蕙教授。一来二去,谈话投机,我便成了赵先生、杨老师府上的常客。掐指算来,她当年正好是我现今这般年纪,刚逾花甲。

我们的话题又转向杨先生获得南京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一事。能在百岁高龄喜获这样一个文化奖项,的确令人欣慰和振奋。

我父亲朱启奎1940年受党的指派,从上海孤身一人来到南京开辟地下工作和抗日斗争隐蔽战线。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先后主管过南京市委宣传部。杨先生至今仍以“老部长”称呼他,亲密无间。据说巫宁坤曾经质问杨先生,你不是一向都不喜欢跟高干和干部子女交往吗?杨先生对他说:他们父子俩可不一样!

说起来,杨先生的父亲曾经是民国时期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但杨家也曾对新中国的建立有过贡献。她母亲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毅然捐出四万银元,交给了大女婿所代表的重庆地下党。早在“一二·九”运动的洗礼中,由于不满家庭鸟笼式的管束,少女杨苡就曾写信给巴金,寻求精神力量,并得到了回信,两人从此开启了彼此一生的友谊交往。收到巴金第一封信后,她写了作文《新的我》,开头三句话是这样写的:“我觉悟了!我到如今才觉悟!但是,我并不以为晚!”

不知为何,话题转向了民国,以及不久前掀起的“民国热”。杨先生说,有人以为凡是民国高官,我都会肃然起敬,那可真是太不了解我啦!于是屋子里又响起了一片笑声,因为我们仨都十分清楚那一段历史。一位从少女时代起就要挣脱樊笼、向往自由民主、反对霸权专制的世纪老人,几十年来,无论时事风云如何变换莫测,不变的永远是那一颗为了祖国繁荣昌盛,不懈努力地要追求光明与希望的初心。

(上接第二版)即便在他刚当小编的年代,此等行为也已令人不可思议。那可是“伊妹儿”(E-mail)已然问世的时代,印刷的退稿单也已通行多年,甚至有些报刊声明在先——一律不退稿,三个月不见报,作者可自行处理。谁还会去理会这一缕松烟风流?

然而,陶文瑜不仅用毛笔写退稿信,还对一位素未谋面、不知名的作者,以“先生”称之。论年龄,他比我15岁还多,我纯属后生;论诗与文,他不仅是我的前辈,且对当时的我来说,他的名字堪称“蜚声诗坛”。想来,像我这样投稿未能发表,却受宠若惊的后生,在当时不会仅我一人。

一封用毛笔写的退稿信,简单两行字,如同一束光,照亮一个人的前路。我看重这封退稿信的更大意义,在于这是一位诗人的书帖。如古代的《快雪时晴帖》《寒食帖》一般,是一种真性情的流露。

陶文瑜如此做,实则与苏州这座城市的教化有关。近年我也曾接触过几位年逾六旬、七旬的长辈,提及明显比他们年轻许多的陶文瑜,仍张口就是“文瑜兄”,话里带着亲切,一点没有文人相轻的味道。可见,陶文瑜的做派是有出处的,他本人也是此等做派的受益人。

陆文夫对待陶文瑜,那是真喜欢。爱才,爱得旁人没话说。譬如编辑部不坐班,陆文夫并不是天天去青石弄看稿。陶文瑜对他说:“你这样三天两头上班,我不来呢,怕你牵挂,我这样上班呢,实在有点吃不消,要不你还是调整一下吧。”这就换成了陆夫人管老师嘴里的“有一阵陆老师上班有点起劲,因为待在家里呢,我要做家务,他也没人说个话,所以一直往杂志社跑了”。

陆文夫对后生好,热络,后生对他自然也没话说。譬如他晚年,有一次笔会,陆文夫已爬不动楼梯了。有个背影看似毛头小伙的家伙把陆文夫一背,蹭蹭蹭就上了三楼。人们这才发现,这位有把子力气的年轻人,不是旁人,是当时也已四十开外并不太年轻的苏童。

我不知苏童写《红粉》是不是受过陆文夫《小巷深处》的影响。可无论在艺术手法上他如何幻化笔法,作为读者,我个人的感受总是——《红粉》中的秋仪、小萼,与《小巷深处》里的徐文霞,或许曾在时空里相遇,在某一座桥畔擦身而过……

从来卖文自潇洒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姑苏少有文人相轻的感觉。后来悟出一点,不知对不对——苏州文人,从唐寅那时候起,就卖文为生,结交的人,上至宰相,下到平民。为宰相写文作诗,或者在城里桥畔给小老百姓画个扇子,对卖文者来说,都可以是一门生意。

生意人开门迎客,微笑服务本是常态,做生意又讲究个扎堆图热闹。20世纪90年代,我在苏州生活过几年,多少次在老城里溜达。一次,为寻觅地图上标注的唐寅读书处,我从东中市桃花坞折到皋桥菜场,又往石路方向去,终究是没找到唐伯虎当年究竟坐在哪个位子,不过却看到东中市一条街上都是卖轴承的,那架势就和当时上海的北京东路差不多。这时候我就明白了——做生意要扎堆。譬如那时候上海的好几个古玩城也好,再早之前的黄河路美食街也好,都是这样凑热闹凑出来

的繁华。甚至台湾地区的逯耀东先生回大陆,从飞机上看改革开放之初的夜上海,唯有一条黄河路是灯火通明的。逯耀东在《寒夜客来》一书中记叙了他自1949年之后,第一次重返大陆的一些事。譬如在苏州找朱鸿兴吃面,却不是儿时的味道。

逯耀东先生过世多年了。我想,假如他还活着,现在去苏州,在同得兴或其他什么这几年翻出新花头的面馆,能否还能尝到比老苏州更新派却不失正宗的味道。

2004年7月,我和朋友刘建春在苏州大学存菊堂观看青春版《牡丹亭》,那时的感觉就是如此。白先勇主持制作的这台大戏,譬如服饰的豪华也好,舞美设计也好,肯定与早年间昆曲并不一样。简单一句话——豪华得多又不失雅致。然而,昆曲名家汪世瑜、张继青把关并调教出的俞玖林、沈丰英,那水磨昆腔仍在,那属于昆曲的青春身姿重现,怎能说青春版《牡丹亭》不是昆曲原汁原味?

后来,青春版《牡丹亭》到伦敦演出,也到北美巡演过。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苏州古典园林建筑公司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造了一处苏州园林——明轩。2017年我去大都会博物馆,特地找到明轩,只为了在异国体会一缕江南之味。那时候我就在想,苏州园林能走出国门,而那些江南的故事为何少有传遍世界的?诚然,我们说汤显祖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伟大剧作家,可也得承认,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在中国范围内,知道莎士比亚的人要比知道汤显祖的人更多,更遑论冯梦龙这样的吴下词奴。

许多人是努力过的。大导演谢晋甚至

在20世纪90年代初去拍《三言二拍》改编的电视剧。但总体上,似乎只起到了一些明清传奇的普及作用。

陶文瑜的离去,包括他人生最后阶段写的诗,对我最大的触动是——也许我们没有真正体会到苏州文人,特别是卖文为生的文人的一种潇洒。如果我们能真正明白这种潇洒,那是从来能将文学做到大雅大俗,像对待烹饪一般对待码字,可以为稻粱谋,也可以纯然不顾一切地在自己内心的诗园里种花种草乃至存心抛荒。

就像范小青,可以写《裤裆巷风流记》《采莲浜苦情路》,也可以为了高稿费去写电视剧。之后又坦言确实是为了高稿费才去写电视剧,且对那些电视剧自我评价甚是不高。

这就是一种坦诚。对自己创作道路的坦诚,亦是回看自己人生的坦诚。

想来,没有一个作家真能做到字字玑珠。李白杜甫都有不少应酬之作泛泛之歌,行过水穷处,方能坐看云起时。对于苏州城里舞文弄墨的这一代、两代、三代人来说,莫不如此。

记得我寄给《苏州杂志》,落到陶文瑜手里的诗稿,很短的一首小诗,陶文瑜编后待发,二审后没有发出的,《寂寞》——在雨夜//风也会寂寞//是寂寞,其实有两种//一种是,静静地躲在角落//还有一种,就像是雨夜的风//呜呜呼啸,列列吹过……

如今,香雪海的梅花即将寂寞地绽放,我只能枯坐家中想象花色,梦魂清处,疏影横斜。不过,落花时节也好,梅子黄时也罢,总是梅骨仍在,风中有梅香依依。在江南,风过,涟漪,水痕。悠长,悠长……